

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丛书

历代昆明地方文献述评

昆明图书馆文献参考部
云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编纂

云南美术出版社

A Review of Kunming's Historical Literature

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丛书

历代昆明地方文献述评

昆明图书馆文献参考部
云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编纂

云南美术出版社

A Review of Kunming's Historical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昆明地方文献述评 / 昆明图书馆文献参考部, 云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编纂.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5.8

(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丛书)

ISBN 7-80695-257-8

I. 历... II. ①昆... ②云... III. 文献—研究—昆明市—古代 IV. K29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7030 号

责任编辑: 黄云松

装帧设计: 徐 芸

责任校对: 余 祁 胡国泉

历史文化名城丛书

——历代昆明地方文献述评

昆明图书馆文献参考部 编纂
云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 字数: 120 千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695-257-8/Z·70

定价: 22.00 元

序 言

周 忻

云南素有“彩云之南”的美称,这既是对这块红土地地理时空的诠释,也是对高原生态环境心理审美的表述。

在彩云南现的红土地上,作为首善之区的昆明,群峰耸翠,川泽淳浓,河海晶莹,田原广衍,气候宜人,风景秀美,地灵人杰,典籍荟萃,古滇文化源远流长,并独具边疆民族特色。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由于自古受荆楚文化及巴蜀文化的影响,云南各民族在铸造其各自特色的自身文化的同时,通过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一脉相承,使祖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奇珍异宝,在滇云大地上留存下来,至今仍放异彩。如立在安宁葱蒙卧山的王仁求碑,就保存了中国书法劲秀兼长的传统,既得“二王”神韵于中原,又不失边疆民族挥洒豪放的风格;又如皮藏于云南省图书馆的《南诏大理写经》,不仅是滇中最早的写本,而且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堪与敦煌卷子相媲美。为了更好地保护、开发、利用这些乡邦文物、文献,弘扬古滇文化,就需要一些有识之士,锲而不舍地进行开拓和耕耘。

最近,为了体现科学的发展观,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特别是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中当龙头,认真落实昆明市委提出的“夯实文化体制改革八条措施”,切实解决汗牛充栋与读者对文献图书特定需求的矛盾,使昆明图书馆事业登上新的台阶。省、市两图书馆领导和专业人员,黽勉同心,携手协作,共同策划编撰出版《历代昆明地方文献述评》一书,收录



推介了众多的昆明地方文献,堪称阐幽发微、钩玄提要、有助检索、颇具特色的二次文献。

披览书稿,我认为特点有五:一是符合地方文献书目的内涵,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昆明的地区文化特点,显示了区域性;二是继承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以传统“叙录体”形式为读者揭示群书要义,使之能执简驭繁,识别源流,由旨归而得领悟,由提示而别是非,启一捷径,俾易深入;三是体现了传统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勘异同,论定是非”;四是收录文献图书具有一定广泛性,符合宋代目录学家郑樵所提出“通录古今有无之书”的要求;五是此书体制在编排上吸取了地区编排、分类编排、年代编排之长,对所收“记载昆明史事之书”,“昆明人著述之书”,“昆明纂修之地方志”,一千二百余种,以类相从,按“经、史、子、集”四类分类,做到布居有序,条分缕析,目眉清楚。总之此书之成,可直接为读者及课题研究者所利用,免了广稽深钩之劳,使所著录的文献发挥积极参考作用。当然,此类书录昔已有之,方国瑜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就是一部有价值的书录专著。但所收文献仅及史部图书,颇感偏而不全,而此书则比较全面。

从事古籍整理及书录解题的编制,作用是潜在的,短时间难见成效,必须铢累寸积,如果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急功近利,是难以奏效的。只有淡泊宁静,才不会焦躁,“才不那么孜孜以求之,愤愤以豪之,斤斤以谋之”,安于清贫,不赶热闹,心甘情愿坐冷板凳,在这块学术阵地上出成果。这本《昆明古近代地方文献述评》的编著者们,正是这样做的。作为市文化工作的领导,在此期冀图书馆工作者树立这种学风,多出成果。



编委主任：周 忻

编委副主任：李安民 魏玉坤

主 编：李友仁 郭春莲

顾 问：李孝友 朱惠荣

编 委：胡国强 何庆德 龚相奇 张燕青

付铁艳 毕国兰 濮 翱 马涵文

张多多 寇 平 龙李文 周 丹

张云湘

编 著：李怡苹

序言

第一章 总 论

- 第一节 昆明历史文化名城建置沿革 (1)
- 第二节 昆明地方文献的发展演变 (8)
- 第三节 昆明地区地方文献收录标准及范围 (13)

第二章 昆明地区历代编著的地方文献

- 第一节 经部之书 (14)
- 第二节 史部之书 (22)
- 第三节 子部之书 (47)
- 第四节 集部之书 (66)

第三章 昆明地区历代纂修的地方志书

- 第一节 概 述 (113)
- 第二节 通 志 (119)
- 第三节 市 志 (145)
- 第四节 府、州、县志 (151)
- 第五节 昆明地区历代纂修的乡镇志、乡土志 (184)
- 第六节 昆明地区历代纂修的山水志 (186)

第四章 昆明地区历代地方出版物

- 第一节 昆明地区古代地方出版物 (190)
- 第二节 民国年间《云南丛书》的刊印
情况及历史意义 (200)
- 第三节 民国年间昆明地方出版物的
情况 (204)
- 第四节 抗日战争时昆明地区的出版
事业 (207)

- 参考书目 (210)

- 后记 (212)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昆明历史文化名城建置沿革

昆明历史源远流长，数千年往事，使人为之萦怀。

几万年以前，滇池地区的人民，就在这高原湖畔生产和生活，经历了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原始公社时期。

大约二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属于氏羌语系的叟族，从越嵩渡过金沙江而南，到了滇池一带，在这块肥美的湖山土地上生活栖息，并且和傣僮族的“蒲”、“僚”一道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写下了灿烂的生活篇章，成为祖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昆明不是民族的摇篮，这里不同时的种族，都是由甘肃、四川和长江流域等地区迁来，在古代经历了斗争融合的历史进程。

战国时代，诸侯千方百计拓殖疆土，楚国以两湖为中心，不断向云贵扩展。大约在公元前 277 年，秦楚两国发生战争，楚国战败之后，为了巩固后方，楚威王派遣大将庄跻带领一支人马，长驱直入滇池地区，到了昆明、晋宁一带。由于当时滇池周围“其地平敞，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庄跻使用武力威胁当地各部落归顺楚国，恰好这时秦国又夺取了川黔地带，阻塞了庄跻归报的道路，只好留在云南，在那“肥饶数千（十）里”的滇池周围所住的居民影响下，不得不“变服从其俗”定居下来，傍滇池立国，驻于今晋城附近，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促进了滇池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汉族向滇池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也是中原与边疆在经济文化上交流的开始。



西汉初年，由于采取“予民休息”的政策，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与云南的经济联系也日趋密切。四川商人把内地生产的铁工具及手工业品，从“五尺道”运入滇池地区交换牲畜，对南中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的统一形势，要求在南中设置郡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派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以兵临滇，击败了劳浸、靡莫诸部落。滇王常羌向汉朝首先表示内附，受到汉武帝的重视，赐印加封为“滇王”。郭昌与卫广在“平定西南夷未服者”后，汉设益州郡，郡治与滇王驻地同在今晋城附近，下设郡县：昆明为谷昌县，昆阳为建伶县，晋城、呈贡为滇池县，安宁为连然县，富民为秦臧县。对这些郡县，汉朝采取从内地派遣官员与任命地方贵族相结合进行管理的方针，这样既照顾了统一，又适应了地方情况。同时还从中原地区迁移人口来滇池地区进行垦殖。从此在封建太守统治和奴隶主滇王统治相并存的制度下，滇池地区的社会有所发展。

新莽和东汉时期，派到南中作太守的文齐，“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又招集流散汉人，安置居民，组织劳力，进行屯垦，从而收拾了滇池地区一度因为战争造成的残破局面。以后王阜相继派到南中，由于他“持法公正，宽慈有化”，从而使“政教清静，百姓安业”，同时“始兴学校，渐迁其俗”。由于他们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好事，社会又有所前进。在这段时期，滇池地区的奴隶制度逐渐瓦解，封建的方土大姓代之而兴。对于南中古代的历史有所促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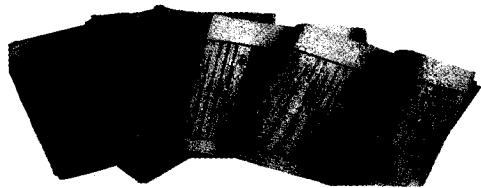
东汉末年，由于内地军阀的分裂割据，南中“大姓”乘机而起，掌握了滇池地区的地方政权，雍闿、孟获把持了益州郡，代替了地方民族首领和汉官。三国初年，称为“昆”的民族与称为“叟”的民族发生了矛盾，形势向着分裂的方向发展。为了避免四川与云南经济文化联系的中断；为了遏制孙吴利用这一矛盾向南中扩张势力，蜀汉丞相诸葛亮于建兴三年



(225年)出师南征,5月渡泸(即今金沙江),深入云南,降服了“大姓”孟获。到了滇池地区,以“不留人,不留兵,扶持大姓”的政策,并通过“收用豪杰”,把争取过来与民族有关系的“大姓”作地方官吏。如用爨飞作军领,用孟获作御史中丞,从而出现了“夷”汉融洽相处的稳定局面。并且通过“大姓”,使南中各族人民“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供军国之用”。并在两汉建置的基础上,添置六郡,更便于集中管理。这样既解除了后顾之忧,又能取资南中,可以说诸葛亮把两汉以来对待南中不同民族地区的政策,推进了一大步,这既符合当时形势的发展,也符合于当地各民族的愿望。一千七百多年来,诸葛亮的业绩,一直为滇中人民所传颂。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晋朝,沿袭以往原设的郡县制度,仍然采取团结南中大姓的政策。但不久又设“南夷府”,派李毅作“南夷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都监行事”,一反以往政策,对南中“大姓”进行排斥;继后又派王逊作宁州刺史,驻守天女城,一面打击排斥“大姓”,一面对郡县作了频繁的更动,结果导致了“大姓”联合“夷族”进行叛乱。爨氏势力渐强,趁机在南中称霸,爨琛自立为王。晋朝只得封他为宁州刺史,承认其世袭,因此到公元750年左右的爨日进,统治了滇池地区四百多年。这段时期,都把这里称叫“昆川”或“昆州”,在经济上是“户户殷众,金宝富饶”、“邑落相望,牛马蔽野”。在文化上,可以从文章书法精美见称的《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窥见一斑。

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局面,有利于各族之间的往来与联系。开皇初年,滇池地区的爨玩遣使朝贡,主动归附隋朝,受封为昆州刺史。以后南中“大姓”时叛时服,隋朝派史万岁南征,攻破三千余部。南中诸族非常害怕,派人献径寸明珠,向隋表示臣服,并勒石赞颂隋朝美德。但是隋王朝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经营滇池地区很快就灭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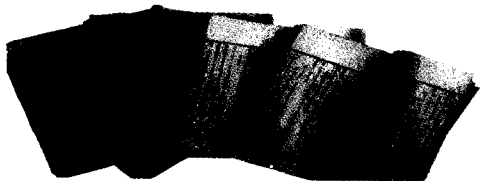
唐朝在公元 618 年建立后，中原社会秩序逐渐安定，生产日趋恢复，与边疆各民族的联系也随之紧密。从公元 618 年 ~ 621 年间，唐朝在云南先后设置了 92 个州，隶属以四川宜宾为中心的戎州都督府管理，滇池地区就是这 92 州中的主要部分。唐朝也采取委派当地各族首领为刺史的政策，让他们管理本地区的事务，但必须与都督府发生联系。实际上属于羁縻性质，羁縻州的建立，不仅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反映出当时边疆各族人民赞成平等的联合，客观上促进了当时滇池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武则天当政时期，滇西洱海地区的蒙氏势力开始抬头，安宁大姓王仁求附唐联爨，抗拒蒙氏。此后由于唐朝一度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失当，加以南诏贵族不断向外扩张，公元 746 年，蒙氏皮罗阁进兵安宁，消灭了爨氏，进入滇池地区。以后又进占了姚州，引起唐与南诏多年的战争，造成了边疆与内地在政治上的一度分裂。但在人民当中，不论经济和文化，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南诏曾经在今晋宁南面三四十里的地方，建筑过一座“拓东龟城”。不久在三次打败唐朝军队大规模进攻之后，为了保卫东部疆土，扼守通向西川与交趾的要道，经过多方选择，审察形势，认为昆川“山河可以为屏藩，川陆可以养人民”，便于赞普钟十二年（763 年），派遣凤伽异在这里修筑拓东城，把城池建在偏东的（相当于今拓东路状元楼）一带，这样就控制了兵家必争的金马山要隘，设置了拓东节度使，称为东京、东都或上京。从这时起到公元 936 年，中经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拓东城仅次于洱海地区的阳直咩城（今大理），成为南诏的第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拓东城的出现，是昆明正式建城的开始。

进入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以后，南中也出现了郑、赵、杨、段地方政权的频繁更迭。赵宋王朝建立以后，段氏在公元 937 年夺取南诏政权，建立大理国，把云南统一起来。由于宋朝统治力量较弱，无力顾及西南边疆，使大理在西南一隅成为独立力量。当时行政区划的设置，也是按白族封建主们的



统治需要来划分的，共设了八府四郡，其中的鄯阐府，就是管理滇池地区的行政区划。城址就是南诏的拓东城，虽然仍是“东都”，但在形势上已较大理更为重要，规模也有所扩展。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兴盛，繁华的市中心便逐渐移到盘龙江以西（今金碧路、三市街）一带。大理国主经常驻蹕于此，段氏第十代国主段素兴，曾在这里广营宫室，并筑“春登”、“云津”二堤，称叫“遗道金梭”、“紫城银梭”。据说金梭全种迎春柳，黄花入河，如同金汁一般，所以呼叫金汁河；银梭全种素兴花，白花入河，如同银汁一般，所以呼叫银汁河。清朝倪蜕认为“此二堤捍御蓄泄，灌溉滋益，大有殊功，或素兴为之，亦有深意，不仅仅为游观设也”。说明大理国时期，鄯阐城的建设，已注意到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人们都认为宋太祖“玉斧一挥”，便划开了宋朝和大理的关系，其实内地和边疆的联系并未中断，在经济和文化上，一直有着频繁的交往，宋与大理曾在广西邕州横山寨设市买卖马匹，由于“蛮马之来，他货亦至”。云南所产的胡羊、长鸣鸡、披毡、麝香、药物及云南刀，都载运到横山求售。买回的东西除锦缯器用之外还有文书，如乾道九年（1173年），段智兴派李观音等23人到横山市马，就换回《五经》、《三史》及医药书多种，从而推动了滇池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元朝在灭宋以前，曾在公元1253年，派忽必烈率军南下，分三路进攻云南，用革囊渡过金沙江，攻陷大理后，即领兵北还，命大将兀良合台继续东进，于公元1254年攻下了鄯阐城。元朝统治势力到达昆明地区以后，为了稳定局势，先后建立了一整套适合当时云南情况的统治机构。按大理国统治区域，分别设置万户、千户、百户，任命贵族充任万户长、千户长和百户长，帮助蒙古贵族统治各部。作为过渡形式，公元1254年置“昆明千户所”，“昆明”二字，此时开始作为这里的地名。公元1274年，元朝派赛典赤·赡思丁来做云南的平章政事。



公元1276年，设云南行中书省，下设路、府、县各级行政组织。从昆明来说改鄯阐府为中庆路，辖四州十一县，派“梁王”镇守。从此昆明不仅成为云南行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北通往大都（北京）、南连南海的西南重镇。城市建设的规模，较鄯阐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中庆城比鄯阐城向外扩展了一里多，又称“鸭池城”。公元1284年，途经这里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中还有了佛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为杂居之地”，郊外有丰产的米、麦、鱼、盐，而且“用其他谷类加入香料，制成酒，清澈可口”，东门外的大德桥（即现在的德胜桥）下有若干船只，看来水陆交通都很便利，所以马可·波罗认为“系一壮丽大城”。由此可见昆明城市规模，在七百多年前的元代，已奠定了初步基础，从那时起，它既是一个“山川明秀，民物阜昌，冬不祁寒，夏不剧暑”和“万家灯火”的城市，又是一个“奇花异卉，四序不歇，风景熙熙”的名胜区了。

明朝建立以后，于公元1381年派傅友德、蓝玉和沐英率师进入昆明，消灭了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留沐英作镇守国公。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形势逐渐发生变化，明朝通过“改土归流”，在全省设置了最高行政机构“云南布政使司”，改中庆路为云南府，府治就在昆明，并且第一次在这里筑起了砖城。新建府城九里，共开六门，建起六座城楼，其中前正门上的城楼，就叫“近日楼”。城外有护城河；城内以五华山为中心，修建了比元代更多的衙门、宅院和牌坊。当时省、府、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机构，集中在昆明城内。城南为居民区，划分为若干“里”。东关、南关为“商阜之地，列肆纵横”。商旅多在三市街一带进行茶马交易。直到明朝末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来到昆明，仍见城市经济非常活跃，他在《游记》中记载当时城里设有饭店、旅社和茶馆，这类服务性行业不仅多，而且都能做到使人满意。昆明每逢子、辰、午、戌



日，还赶街子，经营农副产品及土特产，“日中而聚、日夕而罢”。不仅如此，城内还规划了风景名胜区，凡有林壑之美的地方，如九龙池、水云乡、思召堂及梅庄等，都建有亭台楼阁。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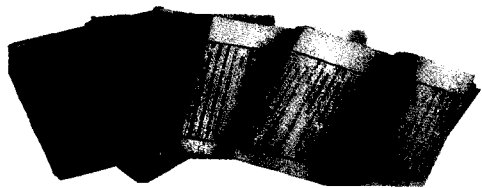
清朝建立以后，灭掉了割据云南一隅的吴三桂所建的伪周，统治了昆明，此后直到公元 1911 年的 230 年中，在建置上始终沿袭明制，昆明城市规模，没有超出明代的范畴。只有由于兵燹战乱及自然灾害，清政府不得不对府城加以维修。根据记载：有清一代，对昆明城共修过 23 次。从城市状况来看，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在城里出现了会馆、牙行、戏院、钱庄及公园等过去所没有的机构，使昆明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盛市。

近百年来，昆明这个古老的城市，经过公元 1884 年的反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公元 1911 年的“重九起义”；公元 1915 年的“护国运动”，成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西南重镇。

公元 1922 年正式设市，直到解放以后，昆明一直是云南省的省会。

公元 1926 年，昆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从此市内不少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前仆后继地进行着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特别是 1945 年“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诗篇。从此，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全省许多地区建立了游击队，进行了武装斗争。公元 1948 年的“七·一五”学生运动、公元 1949 年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都给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公元 1949 年 12 月 9 日，在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军号声中，昆明和全省一样迎来了和平解放。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昆明市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前昆明全市各族人民，坚决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确执行党中央关于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把昆明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城市而奋斗。

第二节 昆明地方文献的发展演变

在祖国云南边疆，作为首善之区的昆明，不仅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且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汉代开“西南夷”设置郡县后，政治、经济、文化一直和中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仅大量的中原古代文献传入滇中，而且流寓来昆的中原人士与本地土著文化人在不断交流学术文化的基础上，著述、传抄和刊印了许多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典籍。

秦统一六国，在西南地区“通道置吏”，随着常颀对“五尺道”的修通，中原官吏与流徙汉人，带来了中原文化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汉在“西南夷”设置郡县，进一步使云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中原保持着紧密联系。汉章帝元和年间（公元84~86年），益州阆中人许叔，入中国受五经”，回来后“即以俎豆皮弁之礼，归教郡人”。与此同时，汉王朝派往云南作太守的王阜、文齐等“始兴学校”，以今文经学教授生徒，并察举孝廉，中原典籍随之南传。由于图书的流通，使滇池地区“渐迁其俗”，并且“夷风不变”。

南北朝时期，据昭通现存的《孟孝琚碑》记载，彝族先民的子弟孟孝琚“十二岁曾入中原，受《韩诗》兼通孝经”，为了供奉这个贵族子弟到成都游学，当时来往于滇、蜀之人也带回了中原典籍，为朱提堂郎文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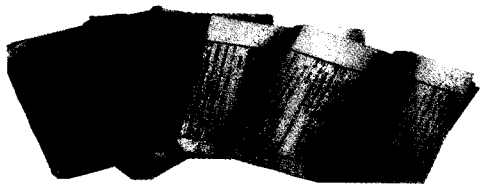
南诏时期，南诏国主曾派遣一些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唐朝西川节度使不仅提供“廩膳”，而且延师对其“赐书习读，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这些“殆以千计”的人学成归里，也带回了不少汉文献。由于这些图书在南诏境内的传



播，使其社会“蔼有华风”；同时由于战争关系，“剑南通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家散之彼州”，特别是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大将军王嵯巅攻陷成都，回军时“掳子女百工数万引而南”，这当中的一些文化人，也带来了不少四川卷轴及拓本，为云南文献的皮藏奠定了初步基础。

宋代由于雕版印书的采用与推广，形成了官刻与私雕并举，图书之府以杭州、成都及建阳并称，四部典帙无不出之于此。版印书籍正所谓“肇自唐时，行于五代，精于宋人”。但由于赵宋王朝采取“宋挥玉斧”的政策，使中原已普遍推广的雕版印书的新技术仍未传入云南，故在大理国时期，对于图书的需求，只有求之于外，即通过遣使求取及“互市”从中原内地获得“儒书”。如“崇宁二年（1103年）使高奉运奉表求取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个二部”；在乾道九年（1173年）冬，大理人李观音等二十三人至横山寨求市马，通过与邕州知州姚恪洽谈，从内地得到《五经广注》、《文选》、《初学记》、《三史加注》、《春秋后语》、《五藏论》、《切韵》、《玉篇》、《都大本草》等书籍，这些文献图书的南传滇云，不仅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的联系与交融，同时也给云南图书的皮藏流通及编印以启迪，正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讲的“今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

元代在云南建立行省后，为使各族人民能“渐摩化其心”，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提倡兴学立教，诵读儒书，命贺天挺为“风教官”，西到大理、永昌，东到乌蒙的路、府、州、县建孔子庙，置学舍，皮藏儒书，在客观上为云南文献的流通及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与此同时，由于受四川刻印图书的影响，中庆路（昆明）已开始用鹤庆白棉纸作材料，写刻雕版印刷佛经，而且附有边疆艺术风格的孔雀版画，以后又雕版印行方志。元代的云南，从滇池地区的中庆路到洱海地区的大理，造纸技术及雕版工艺已达到一定水平，文献图书的皮藏与流通也随之发展和丰富。



明朝初年，朱元璋派蓝玉、傅友德、沐英定滇后，下令云南布政使司之“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永乐时又广建“社学”，凡“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送入社学读书”。以后又建书院。由于各类学校的兴办，教材成为社会一大需求。为了读经阅史，学校也开始庋藏典籍，以借士子披览，这就促进了云南编印图书和藏书的发展。当时云南刻书，主要是云南布政使司中的济用库出资纠工刊印，并主管经理全省图书事宜。据《云南通志·艺文志》记载，在明一代，云南府及安宁州等地就刻印过《五经大全》、《资治通鉴》、《医方选要》、《古文会选》、《陶情乐府》、《花间集》等数十种书，刊印图书几乎遍及全省。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私人刻书，如昆明学者就以私家之力刻印过嵩明著名学者兰茂《韵略易通》。由于刻书事业的发展，也为图书的庋藏流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昆明官渡的王思训，作京官多年，告老还乡时，朝廷赐书甚多。王氏生平嗜学，俸禄悉以购书，离京前又选购万余卷，车载而归。回乡后，建“赐书堂”以藏书。所藏之图书，举凡圣经贤传，图谱地志，私乘野史，虞初稗官，乃至冷僻数落之书，无不收藏，这算是昆明私家藏书楼之滥觞。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末世，但此时日渐衰败的封建社会又出现了“回光返照”，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出现了兴盛一时的表象，所谓“康、雍、乾三朝盛世”。从云南来看，通过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吴三桂反清事件后，不久又实行了“改土归流”，特别是清朝统治者对云南军政制度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和变革，从内地到边疆地区进行了有效的开发，从而使“沙普之乱”以来的衰退经济得到复苏。经济的发展，对文化图书事业势必有所影响，而且就在这样矛盾的社会背景下缓慢地前进和发展。在清代，云南从省到府、州、厅、县普修方志，致用之书、传世之作倍增。昆明地区除刊印几部通志外，还刻印过张毓碧的（康熙）《云南府志》及戴炯孙撰修的（道光）《昆明县志》。其次是人才辈出，代有传人，